

·二十世纪文献学·

二十世纪《三国演义》文献研究述要

韩 伟 表

《三国演义》^①文献研究是指小说文本研究以外的作者、版本、源流的求索考证。纵观二十世纪《三国演义》研究,大略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二十世纪初至1949年,是《三国演义》现代学术研究的肇始期,《三国演义》文献研究开始起步,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第二阶段从1949年到1976年,是《三国演义》研究的一元化阶段,《三国演义》文献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第三阶段为1976年至九十年代末,是《三国演义》研究全面繁荣、多元发展的阶段,也是《三国演义》文献研究新见迭出、成果最为丰盈的时期。本文拟就上述三个研究阶段,从作者、版本、源流三个方面,对二十世纪《三国演义》文献研究状况作一梳理,鉴往知来,以期对二十一世纪《三国演义》文献学建设以及整个《三国演义》研究有所裨益。

一、作者研究

明清以来,诸家载述对罗贯中之于《三国演义》的著作权几无异议,但对罗氏的生平均语焉不详,且多舛错讹谬^②。二十世纪初的学者如鲁迅、谢无量、郑振铎等,一方面爬罗剔抉明清诸家载述,对罗贯中的生平、著述做了粗略勾勒;另一方面,则努力寻访、钩沉新的资料,发掘新的研究线索。1930年,郑振铎、马廉、赵斐云访书宁

波时,发现了明无名氏《录鬼簿续编》,其中有罗贯中的“忘年交”关于罗贯中的一段小传。鲁迅在《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中对这一发现的价值给予高度评价,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据此得出的罗贯中乃“元末明初”人的观点,遂成为数十年来的权威说法。

1949年之后,《三国演义》研究进入第二阶段。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在《三国演义》的思想、形象领域,作者研究未受到重视。只有六十年代初周邨、冯其庸等人对罗贯中的生活时代有过一次短暂的讨论。1962年周邨在《江海学刊》第7期发表的《书元人所见罗贯中〈水浒传〉和王实甫〈西厢记〉》一文中,认为作《水浒传》的罗贯中是南宋人或宋元间人。冯其庸在该刊1963年第7期发表《论罗贯中的时代》,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罗贯中约生于1295年前后,死于1379年左右。这次论争没有充分展开即不了了之,但这是试图对该问题做出具体界定的较早的探索。

1976年后,《三国演义》研究走向全面繁荣。作者研究一度成为研究热点,主要围绕著作权、籍贯、生活时代、交游、著述等几个方面展开。

关于《三国演义》的作者,有部分学者否定罗贯中的著作权。周邨发展了他在六十年代的“两个罗贯中说”,张国光等人提出了“蒋大器说”,张志和则主张“南方说书艺人集体创作说”。但诸“新说”响应者寥寥而辩驳者甚夥,“罗贯中说”依旧是主流观点,因此关于作者的生活时代、籍贯、交游、著述等的讨论仍主要围绕罗贯中展开。

明代以来,关于罗贯中的籍贯有东原、太原、钱塘、庐陵诸说。新时期的争鸣则集中在前两说上。王利器、沈伯俊等根据许多《三国演义》明刊本的题署和《水浒传》中的一些内证,认为罗贯中是东原人。孟繁仁、刘世德等则在肯定《录鬼簿续编》之记载的权威性的基础上,结合创作中的故土性观念等内证,认为罗贯中原籍太原。刘颖、杨海中、杜贵晨等根据《水经注》中有关记载及《录鬼簿续编》

地名运用习惯,认为《录鬼簿续编》中的“太原”应指“东太原”,即“东原”^③。

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不满足于“元末明初”的笼统说法,接续六十年代的周、冯等人的论争,对罗贯中的生活时代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欧阳健认为周楞伽、王利器考定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中的“罗本”即罗贯中是可信的,按照门人之间“序齿”的通例,可以推算罗本的生年约在1315—1318年,卒年约在1385—1388年,这一结论验之《录鬼簿续编》的记载也基本相符。刘世德也持类似看法。但也有许多学者对“元末明初”说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罗贯中当为元人。章培恒、马美信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前言”中,根据《录鬼簿续编》的记载和小说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似当写于1329年之前,其时罗贯中为三十岁以上。袁世硕则从对嘉靖壬午本中引用的330余首诗词的分析入手,认为罗贯中的生活时代应在1300—1370年间。刘友竹也持这种看法。杜贵晨根据古代小说刊刻流传的基本规律和《三国志平话》的刊刻时间及他发现的一些新材料,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的时间在1323—1329年之间;文章虽没明言罗氏的生卒年,但认为罗贯中为元人也是无疑的^④。

关于罗贯中交游的探讨,在新时期也比较热烈。主要集中在与《录鬼簿续编》作者的关系、与施耐庵的关系、与赵宝峰和高明的关系及与农民起义的关系等几个方面。周楞伽否认了《录鬼簿续编》作者与罗贯中的“忘年交”关系(《关于罗贯中生平的新史料》,刊《〈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版)。欧阳健根据晚近发现的材料,认为罗贯中与施耐庵“非师生授受关系”,而是“罗贯中因年岁较小而自居门人”(《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王晓家、顾文若、焦中栋等认为“施耐庵”是罗贯中为避文祸而做的“是乃俺”的隐语和化名^⑤。周楞伽、王利器根据《赵宝峰先生集》卷首《门人祭宝峰先生文》中的“罗本”字样,断定罗贯中是宋末

理学家赵宝峰的门人^⑥。李灵年通过考证也认为“他们之间的师生之谊似无容怀疑”(《罗贯中为赵偕门人辨略》,刊《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王利器还认为门人名单中的“高克柔,当作高柔克”,即《琵琶记》作者高明,因而罗贯中和高明是同学。章培恒则认为罗贯中大写通俗小说、杂剧和“乐府”,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又对曹操有所肯定,这都是跟理学家异趣的,因此,罗本不一定是罗贯中(《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刊《文学遗产》1982年第3期)。金宁芬根据《赵宝峰先生集》四种版本及《宋元学案》中的相关记载,认为门人名单中的“高克柔”不误(《罗贯中和高则成不是同学》,刊1983年4月19日《光明日报》)。欧阳健则根据尊师署名的通例,排除了“高克柔”为高明的可能性(《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针对罗贯中曾参加了元末农民起义的流行说法,李灵年通过考察认为,罗贯中不曾参加反元的农民起义,其“有志图王”,指的是“为朝廷建立功勋,以取得封王赠侯”(《罗贯中“有志图王”辨》,刊《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

关于罗贯中的著述,明清文献的载述及今存作品明清刊本的题署殊多传说、窜改、假托成分,自清以来,就有学人有所怀疑并作了初步考证;但对罗氏著述进行全面系统考察并取得显著成果者,则在新时期。

新时期首先对此问题进行全面系统考察的,是澳大利亚学者柳存仁。他在发表于1976年的著名长篇论文《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8卷1期,收入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中,对罗氏著述作了较为系统的考证。柳氏首先据《录鬼簿续编》之记载,认为罗贯中撰的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可“作为衡量若干其他题为罗氏所作讲史小说真实性之尺度”。通过对文字、情节等的比勘,柳氏认为罗贯中“尝润饰施耐庵《水浒》之旧本,而增插田(虎)王(庆)部分亦其贡献”。但以百回本为代表之繁本系统《水浒》,则“不

能认为罗氏之作品”。今本《大唐秦王词话》和坊刻本《平妖传》只一部分可确定为罗贯中作。《隋唐两朝志传》及《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亦可能为其著作,然现存本已经他人窜改。

柳氏的论断一度引发了八九十年代罗贯中著述研究的热潮。陈铁民、刘世德等再次论定了罗贯中之于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的著作权,同时更进一步强调了该剧对于探索罗贯中的思想、艺术成就和《三国演义》的艺术特征及倾向性的重要学术价值^⑦。高尔丰、曾良、陈国军等经多方考证,排除了罗贯中创作《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的可能性,一致认为该著绝非罗贯中的作品^⑧。沈伯俊通过对《隋唐志传》和《三国演义》雷同情节的史实考察,断定《隋唐志传》“不可能出自罗贯中之手,而只能是后人模仿之作”(《〈隋唐志传〉非罗贯中所作》,刊《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4期)。罗尔纲、欧阳健、徐朔方、程毅中等则对《三遂平妖传》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具体论断虽有出入,但均没彻底否定罗贯中之于该著的著作权^⑨。另外,刘世德认为题署为“庐陵罗本撰”的《说唐传》是一个伪托的作品(《夜话三国·罗贯中是哪里人》)。

关于罗氏著述,争议最大的莫过于《水浒传》。明清时期就已存在多种异说。二十世纪前两个阶段的研究也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八十年代以来,争议几近白热化。形成了“非罗贯中所著说”(以“施耐庵说”、“非罗非施说”、“集体创作说”等为代表)、“罗贯中所著说”(以“罗贯中说”、“山东罗贯中说”、“两个罗贯中说”等为代表)和“罗贯中参与创作说”(以“施罗合作说”、“罗著某续说”等为代表)等三派意见。各说相互辨难,一时间遽难定论。

总体而言,对《三国演义》作者研究中许多问题的突破与解决,学术界还需付出更多的努力。

二、版本研究

二十世纪的《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始于20年代起有关《三国演

义》研究资料和版本的一系列发现。在1924年发现了《三国志平话》之后(盐谷温《关于明的小说“三言”》,刊《斯文》第八编第六号),经过马廉、郑振铎、孙楷第、刘修业等学者的努力寻访,又相继发现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李卓吾评本、李笠翁评本以及众多的万历年间刻本。1929年,马廉据其搜求的调查结果写成的《旧本三国演义调查》(刊《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第2卷第5期),首次著录了自元代至清初除毛本外的《三国演义》版本十六种,初步勾勒了《三国演义》版本演变的轨迹。1933年,孙楷第又汇集他和同时代其他学者访书的成果,著成《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一书,详细著录了二十余种不同版本的《三国演义》,代表了当时《三国演义》版本目录学研究的最高水平。1936年,戴望舒游学西班牙时,又发现了马廉、孙楷第等均未著录的孤本——明嘉靖书林叶静轩及其子叶逢春刊《新刊案鉴汉谱三国志传绘像足本大全》(《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静院所藏中国小说戏曲》,刊香港1941年3月10日《星岛日报》“俗文学”副刊),此本的发现对《三国演义》版本衍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些异于毛本的早期刻本的发现、介绍、著录和出版界不失时机的影印刊行,为《三国演义》的版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1929年,郑振铎依据当时占有的材料,在其长篇论文《三国志演义的演化》(刊《小说月报》20卷10期)中,首次对《三国演义》的各种版本进行了初步考辨。尽管在今天看来,其中一些论断尚有粗疏之处,但它无疑代表了那一时期的版本研究水平,影响深远。孙楷第则在1934年的《〈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传通俗演义〉》(刊《文史》1卷2号)一文中开探索《三国演义》原本之先河。他在对嘉靖本仔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点猜测:(1)“疑原本乃以百余回演之,后人把每回中各章分开,让它们各自独立,才成二百四十节”;(2)“原本或者是《三国词话》也未可知?”孙氏所论虽因臆测而尚有可以商榷之处,但其考索《三国演义》原本的筌路之功则不可没。

第二阶段国内的《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彻底遭遇冷落,27年中

几乎没有一篇专门论文。尚值一提的是1953年和1955年作家出版社对毛本的两次整理印行,顺应了当时的意识形态,有力地促进了《三国演义》的普及和研究。海外的版本研究也同样寂寥。其间只有日本小川环树的研究一枝独秀,他在《中国小说史研究》(岩波书店1968年版)中,首先对郑振铎的版本考辨结论提出了异议。他指出明代万历及以后的若干《三国演义》版本,包含着嘉靖本中完全没有的有关关索或花关索的情节,可见它们并非都是出自嘉靖本。他还以对(花)关索的不同处理为线索,将不同的《三国演义》版本按年代顺序分为三组。尽管小川环树的三个版本组的划分依据不免失之简单,划分结果也尚有疏误不严谨处^⑩;但他能首先发现万历及以后的《三国演义》版本与嘉靖本在(花)关索情节上的差异,修正郑振铎的观点,同时尝试给复杂的《三国演义》版本归类,这都应该算是《三国演义》版本研究中的突破。

第三阶段《三国演义》的版本研究获得全面展开,内容包括版本整理、版系衍变、原本探考、评本研究等方面。

版本整理包括版本调查辑录、版本校理印行。继二三十年代之后,《三国演义》版本的调查辑录在新时期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大背景下又取得了丰硕成果。英国学者魏安结合前贤时学之著录,遍访“欧、美、中、日诸图书馆”,查知迄今存世的《三国演义》版本三十五种。在其199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专著《三国演义版本考》中,详细记录了每种版本的刊行情况、扉页、序目、卷回、行款、字数、卷端版心题记、牌记、图像、评语及藏本情况,代表了二十世纪《三国演义》版本目录学的成就。新时期版本校理印行成果也颇为丰厚。主要有:台湾天一出版社的《明清善本小说丛刊》、中华书局的《古本小说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古本小说集成》、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的《三国志演义古版丛刊》等共影印出版了十余种《三国演义》重要版本。“周曰校本”、“李贽评本”、“钟惺评本”、“李渔评本”等精选精校精注本。沈伯俊以一人之

力,穷近十年之功校理成的数种版本,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和好评。

新时期版本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方面在对《三国演义》的版系衍变和原本的探考上。柳存仁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中对《三国演义》版本系统及衍变提出了新见。他认为“大约在至治本《平话》刊刻之后四十年左右,罗贯中颇有可能撰写《三国志传》,其后遂为其他各本《三国志传》之所宗。在此之后,始有《三国志通俗演义》问世”。柳氏的这一创见成为《三国演义》版本研究的转折点,对海内外的《三国演义》版本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受此影响,八十年代中叶尤其是1987年《三国演义》版本专题研讨会召开之后,国内外学术界开始重视众多的明版《三国志传》,对版系衍变有了一系列新的认识:《三国演义》的版本可分为“《三国志传》”、“《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志演义》”等几个系统;《三国志传》较之嘉靖元年本更接近罗贯中的原作;嘉靖本是一个经过较多修改加工,同时又颇有错讹脱漏的版本;建安诸本与嘉靖本乃是由罗贯中原作演变出来的并列的分支,等等^⑩。九十年代在版系衍变的研究方面取得明显突破的是英国魏安的专题研究。魏安根据《三国演义》诸版本的共同特点,运用串句脱文的比勘方法,基本勾勒了《三国演义》版本的演化关系。尽管魏氏的论断尚有可议之处,但他对现存版本的分类及其运用的方法是比较科学的。魏安的《〈三国演义〉版本考》为新世纪《三国志演义》版本的深入研究确立了一个新的起点。

与版系衍变的研究相辅相成的是原本的探考。尽管海内外学者均认为清初毛纶、毛宗岗自称得见罗贯中《三国志演义》原本,并据以校正“俗本”之弊(毛纶《第七才子书琵琶记总论》、毛宗岗《三国演义凡例》)的说法不可信,但还是激起了许多学者考证“原本”的兴趣。八十年代初期,有些学者简单地把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看作是罗贯中原本;另有学者则根据一些旁证和部分内证,认

为罗贯中的原本是一部长篇的讲史话本。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版系衍变研究的逐步深入,研究者认识到完整的“原本”已失传,因此不再对“原本”作直接的、简单的整体判断,而代之以立足版系衍变的具体考证。周兆新通过详细考证,认为罗贯中原作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利用夹注的形式节录和复述史书,以供读者参考”;没有引用范晔的《论》、《赞》和陈寿的《评》(《三国演义考评》)。澳大利亚马兰安以《花关索说唱词话》为参照,推断“原作包括了更多的传奇素材,使用更为简单、更为原始的手法创作的,只有较少的正史资料,以及仅有尚未发展完善的‘说书人风格’的形式”(《〈花关索说唱词话〉与〈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变探索》,见周兆新主编《三国演义丛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魏安在《三国演义版本考》的最后,认为“罗本《三国演义》的特色是正文分为10卷,每卷首记录该卷的年代起讫,卷一首有总歌,有许多夹注,但是没有任何关于(花)关索的情节,也没有周静轩的咏史诗”。陈辽还认为罗贯中《三国》底本分卷分节不分回,各节题目的字数是不整齐的;正文前有三国君臣《姓氏附录》,但无略、表等(《解罗贯中及〈三国志传〉底本原貌之谜》,刊《安徽师大学报》2000年第2期)。《三国演义》原本探考已具有了较好的认识基础,但具体考证尚有待深入。

新时期对《三国演义》评本的研究也有许多创获。“毛评本”的研究是新时期《三国演义》评本研究的重镇。无论是对“毛本”本身得失、价值的评价,还是对毛纶、毛宗岗父子的生平与交游的考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达成了较为一致的共识。代表性成果有黄霖《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若干问题》、陈翔华《毛宗岗的生平与〈三国志演义〉毛评本的金圣叹序问题》、沈伯俊《论毛本〈三国演义〉》、霍雨佳《〈三国演义〉美学价值》、陈辽《论毛宗岗的历史观》、陈翔华《毛宗岗与〈三国演义〉》等。关于“李贽评本”,黄霖、陈翔华、沈伯俊等一致指出此本评语出自叶昼之手;并且认为它上承“周曰校本”、“夏振宇本”,下启“钟惺评本”、“李渔评本”、“毛本”^⑩。关于“钟惺

评本”的批语,王长友、黄霖等均怀疑不可能出自钟惺之手。盛瑞裕则对“钟评”的价值作了高度评价。“李渔评本”的评语,黄强、黄霖通过考证,也都指出并非出自李渔之手,而是由书商选择、点窜“李贽评本”和毛本评语而成的^⑬。

三、源流研究

作为一部有着漫长成书过程而又影响深远的巨著,《三国演义》的源流演变受到二十世纪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首先涉及溯源问题的是鲁迅和胡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粗略地勾勒了一条“宋代‘说三分’——金元杂剧——《三国志演义》”的线索后,又认为《三国志演义》“凡首尾九十七年(184-280)事实,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间亦仍采平话,又加推演而作之;论断颇取陈、裴及习凿齿、孙盛语,且更盛引‘史官’及‘后人’诗”。胡适在《〈三国志演义〉序》中指出唐代已有说三国故事的了,另外还具体列举了十九种三国题材的元杂剧剧目并作了分类。现代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比较系统探讨的是郑振铎和李辰冬。郑振铎的《〈三国志演义〉的演化》详细论证了《三国志平话》在《三国演义》成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李辰冬则在鲁迅、郑振铎等人的研究基础上,认为三国故事的演变,可分为历史故事时期、民间传说时期、历史与传说综合时期三个阶段,还特别强调了这三个阶段对《三国演义》成书的必要性、重要性(《三国水浒与西游》,北平大道出版社1946年出版)。总的看来,这一阶段的溯源研究虽然缺乏细密的考证,但却比较清晰地勾勒了《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突现了各种艺术形式的三国故事素材对《三国演义》成书的重要影响,体现了现代学者宏阔的学术视野和精敏的理论概括力。探流研究在这一阶段则未受到学者的重视。

与作者研究、版本研究遭遇冷落不同,源流研究在第二阶段受到了较多关注,但总体的表现是轻“源”而重“流”。该阶段学术界对

三国题材的溯源大都为“人民性”和“替曹操翻案”这两大焦点论争服务,不是“八股式”的顺带而及就是“应景式”的罗列比附。有一定进展的是鲁地、雪克等考定元杂剧三国戏在四十种以上^④,一粟钩沉出唐代流行三国故事题材的一些新材料(《谈唐代的三国故事》,刊《文学遗产》增刊第10辑[1962年])。1967年在上海嘉定出土的刊于明成化年间的说唱词话《花关索传》,为研究《三国演义》的故事渊源流变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该阶段重“流”主要表现为专题研究论文的数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首先是关于三国戏曲尤其是京剧的研究评介文章大量涌现;其次是《三国演义》在海外的传播开始引人注目,《羊城晚报》发表了数篇介绍《三国演义》在泰国、日本传播情况的文章。另外冯沅君在《〈三国志演义〉刍论》(刊《山东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中就《三国演义》对长篇历史小说、戏剧、曲艺、诗文、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影响作了初步描述,这是对《三国演义》的影响作具体范畴划分的较早尝试。

自1976年至今,《三国演义》的源流研究有了长足进展,成果喜人,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传统的源、流文献史料学范畴的扩展。在溯源方面,历史史料方面已不再局限于陈志裴注,而延伸到《后汉书》、《晋书》、《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十七史详节》,甚至上溯到了《汉书》、《史记》、《左传》等。文学史料方面曾被忽视的《世说新语》、《搜神记》、《傅子》、《语林》等古小说及唐诗、唐人小说的影响也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戏曲则突破了元杂剧的限囿,进入水饰、参军戏、院本、南戏等新领域;讲史话本除《三国志平话》外,“说三分”、《新编五代史平话》、《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等也为学者所瞩目。苏兴《稗圃摭屑》(《古典文学论丛》第5辑,齐鲁书社1986年版)、《〈三国志演义〉识小》(刊《东北师大学报》1992年第5期)通过对赤壁鏖兵中东吴力主迎曹的谋士、刘备入赘东吴时诸葛亮所授三条锦囊妙计、曹操计赚徐庶等的分析,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罗贯中曾袭

借《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及唐人小说。梅显懋认为《三国演义》中纯熟而精彩的战争描写,借鉴了《左传》描写战争的出色的叙事经验(《〈左传〉战争描写对〈三国演义〉的影响》,刊《社会科学辑刊》1992年第2期)。丘振声、叶胥、冒炘等认为《世说新语》、《搜神记》等魏晋六朝笔记小说对《三国演义》故事情节的提炼、人物形象的塑造等起了较大影响;唐代诗人吟咏三国时代人事的诗篇,对罗贯中的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不少唐诗被直接搬进《三国演义》中,成为整个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⑤。周兆新在《三国演义考评》一著中经细密考索后指出,构成《三国演义》核心和精华部分的内容直接来自宋元讲史艺术中的“说三分”。陈翔华在其三十余万言的力作《诸葛亮形象史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中认为,由历史人物到艺术形象的演变过程,其实就是“历史人物本身的事迹材料”、“历史上可资汲取的其他人物有关故事”、“前代传说与创作的艺术沉积”、“创作者(包括口头传说者、民间艺人与作家)所处时代的要求,以及其本人的生活、思想与文化艺术素养”等诸因子不断交合的过程。作者虽然是通过诸葛亮形象演变的个案考察总结出这一论断的,但由于诸葛亮形象一直处于三国故事题材的核心地位,这一论断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对《三国演义》生成史的概要表述。而在具体的考察中,则基本上包融了上述诸层面。上述种种认识进一步完善了《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

就探流而言,对后世小说的影响已不再限于纯粹的历史演义小说,还包括后传、新编、反案之类的续书及拟话本、《西游记》、《金瓶梅》等其他明清小说。陈翔华《诸葛亮形象研究史》下编第一章,沈伯俊《〈三国演义〉与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的比较》(刊《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2期),李保均主编的《明清小说比较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二章,欧阳健的《〈三国志〉·〈三国演义〉·〈赤壁之战〉》(刊《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和《陆士谔的奇想之一:三国的改革——〈新三国〉析评》(刊《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第1期)等

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戏剧曲艺方面加强了对明清传奇、杂剧、京剧以外的地方戏和评书、鼓词、弹词、龙舟歌、清曲之类说唱文学中三国题材内容的考察。陈翔华《诸葛亮形象研究史》下编第二、三、四章对此有系统论述；李福清在《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中，详细考察了《三国演义》对近现代评话的影响。社会思想研究方面对《三国演义》之于民族交流与融合、清朝开国、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影响作用作了较为系统的探索。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加强，关于海外传播的介绍评述除泰国、日本外，已扩大至韩国、朝鲜、越南、新加坡、蒙古等亚洲其他国家和俄罗斯、英国、法国、美国等欧美国家。王丽娜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和韩国闵宽东的《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之传播》（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两著以重点篇幅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三国演义》在海外的流传、出版、翻译、版本、研究及影响的情况。二书以博、专各擅胜场，成为述介《三国演义》海外传播的力作。

其次是突破了单纯狭义的文献史料考索排比，而拓展至小说修辞、叙事艺术、创作心理、社会思想、时代因素、文化精神等层面。

溯源方面，苏兴认为赤壁之战的描写是罗贯中对元末明初朱元璋与陈友谅、张士诚水战的亲见亲闻感受的艺术升华（《〈三国志演义〉识小》）。曲沐、赵清永、俞樟华等对《史记》之于《三国演义》的历史观、叙事方式、形象塑造、艺术风格等的影响进行了有益的探索^⑥。罗斯宁从艺术角度入手，分析了元杂剧的审美观、题目正名和连本戏的体制、程式化的表演等，对《三国演义》的酣畅叙述描写、章回体结构的形成、类型化人物的塑造等的重要影响（《元杂剧艺术对〈三国志演义〉的影响》，刊《中山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张靖龙探讨了元明之际纵横活动频繁交作的时代风貌对《三国演义》创作的影响，尤其注重三国史料所无而小说虚构的内容（《纵横岁月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刊《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2期）。俄罗

斯李福清在《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第一部分中,重点分析了《三国志平话》在思想基础、人物描写、叙事三方面之于《三国演义》的母题学意义和价值。日本大塚秀高《关羽与刘渊——关羽形象的形成过程》(刊《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百三四册,1997年3月)一文对《三国志平话》结尾所写的蜀汉后主刘禅的外孙刘渊(实为匈奴首领)乘乱起兵,攻灭西晋,即汉皇帝位这一情节进行研究,认为刘渊的“须长三尺余”及爱读《左传》的因素从关羽形象中袭来,而关羽的龙神因素则从刘渊形象中获得;考证详实有据,与李福清的研究可谓异曲同工。母题学的考察对深化《三国演义》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探流方面还表现为顺应社会时代发展,积极开拓了许多新领域。如三国影视艺术、三国文化旅游即其中之代表。因与《三国演义》文献研究关涉不大,故不赘述。另外从《三国演义》脱胎而来的联语、谚语、俗语、歇后语等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⑦。《三国演义》与时俱进的源流研究充分体现了《三国演义》作为经典的深远影响和蓬勃的生机活力。

一个世纪来,许多研究者在作者、版本、源流三个领域爬罗剔抉,辛勤耕耘,取得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和创获,使《三国演义》文献研究成为《三国演义》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盈的领域,不仅为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三国演义》文本、文化研究的深化提供了丰厚可靠的文献保障。但是,回顾《三国演义》文献研究的百年历程,我们也发现仍存在一些问题。如不经缜密的材料考证,率尔立论而引发作者研究中一些无谓的论争;不作细致的版本调研,人云亦云而导致版本研究中的主观臆断;源流研究中素材开掘罗列有余而对作者的创造性重视不够;由于不重视对海内外同行研究成果的及时吸收,造成大量重复性劳动;还有诸如研究方法单一、引证材料断章取义或故意曲解等等。解决好这些问题,二十一世纪《三国演义》文献研究才庶几有望突破上世纪末徘徊不前的

困境,取得更大的进展。

注:

①从现知最早的刊本至今,《三国演义》刊行的主要正式名称不下十数,为行文方便计,本文以《三国演义》作为共名。

②朱一玄、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对“五四”运动前的资料搜集得相当详赡,可参看。

③王利器:《〈水浒全传〉是怎样纂修的?》,刊《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沈伯俊:《关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刊《海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孟繁仁:《〈录鬼簿续编〉与罗贯中种种》,刊《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刘世德:《罗贯中籍贯考辨》,刊《文学遗产》1992年第4期;刘颖:《罗贯中的籍贯——太原即东原解》,刊《济南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杨海中:《罗贯中的籍贯应为山东太原》,刊《东岳论丛》1995年第4期;杜贵晨:《罗贯中籍贯“东原说”辩论》,刊《齐鲁学刊》1995年第5期。关于罗贯中籍贯诸说的优缺点,可参见拙文《罗贯中籍贯研究述评》,刊《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1期。

④欧阳健:《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刊《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刘世德:《夜话三国·罗贯中的生平》,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袁世硕:《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原作》,刊《东岳论丛》1980年第3期;刘友竹:《〈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元代作品》,刊《三国演义研究集》;杜贵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刊《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2期。

⑤王晓家:《〈水浒传〉作者系罗贯中考辨》,刊《水浒争鸣》第2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顾文若、焦中栋:《“施耐庵”为罗贯中托名》,刊《晋阳学刊》1999年第1期。

⑥周楞伽:《小说札记·罗贯中的生卒年新证》,刊《文学遗产》1981年第4期、《关于罗贯中生平的新史料》;王利器:《〈水浒全传〉是怎样纂修的?》,刊《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刊《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2期;《罗贯中高则诚两位大文学家是同学》,刊《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1期。

⑦陈铁民:《〈宋太祖龙虎风云会〉与〈三国演义〉》,刊《文学评论丛刊》第

十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刘世德:《夜话三国·罗贯中写过哪些作品》。

⑧高尔丰:《〈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作者释疑》,刊《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第3-4合期;曾良:《〈残唐五代史演义传〉散论》,刊《明清小说研究》1995年第4期;陈国军:《〈残唐五代史演义传〉非罗贯中所作》,刊《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1期。

⑨罗尔纲:《从罗贯中〈三遂平妖传〉看〈水浒传〉著者和原本问题》,刊《学术月刊》1984年第10期;欧阳健:《三遂平妖传原本考辨》,刊《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3辑;徐朔方:《〈平妖传〉的版本以及〈水浒传〉原本七十回说辨正》,刊《浙江学刊》1986年第3期;程毅中:《从语言风格看〈三遂平妖传〉确为旧本》,刊《中华文史论丛》第55辑。

⑩比如,同是A组版本,嘉靖本没有有关关索或花关索的情节,但周曰校本和其他版本却有关索加盟诸葛亮征南的描述;B组中的乔山堂本含有比A组版本中更为全面的有关关索(而不是花关索)的故事。而同组的联辉堂本、杨闽斋本等则仅与花关索(而不是关索)的故事有关等等。

⑪张颖、陈速:《有关〈三国演义〉成书年代和版本演变问题的几点异议》,刊《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1期;陈翔华:《诸葛亮形象史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周兆新:《三国演义考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周兆新主编:《三国演义丛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沈伯俊:《校理本三国演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前言”;厚艳芬:《〈三国演义〉版本演变述略》,刊《北方论丛》1996年第4期。

⑫黄霖:《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若干问题》,刊《〈三国演义〉研究集》;陈翔华:《诸葛亮形象史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沈伯俊:《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整理本(巴蜀书社1993年版)“前言”。

⑬王长友:《〈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探考》,刊《〈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版;黄霖:《关于〈三国〉钟惺与李渔评本两题》,刊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第一号(1995年6月);盛瑞裕:《独具奇妙的钟批〈三国〉》,《传统文学新论》,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黄强:《〈李笠翁批阅三国志〉质疑》,刊《晋阳学刊》1993年第5期。

⑭鲁地:《三国演义论集》,东海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雪克:《关于元杂剧的贬曹倾向》,刊《杭州大学学报》1959年第3期。

⑮丘振声:《三国演义纵横谈》,漓江出版社1983年版;叶胥、冒炘:《三国演义创作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三国志演义〉与古小说初探》,刊《扬州师院学报》1986年第1期;于洪江:《试论〈搜神记〉对〈三国演义〉的影响》,刊《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徐虎:《试论〈世说新语〉对〈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影响》,刊《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第1期;刘治立:《〈傅子〉与〈三国演义〉》,刊《成都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⑯曲沐:《〈三国演义〉和〈史记〉》,刊《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赵清永:《〈史记〉对〈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影响刍议》,刊《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2期;俞樟华:《史记新探》,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

⑰丘振声:《三国演义纵横谈》;王廉官:《与〈三国演义〉有关的歇后语》,刊《新村》1983年第5期;冯全生:《联说三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李树新:《三国文化熟语探析》,刊《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海洋学院中文系,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2004 年封面小识

《文献》季刊 2004 年封面使用了国家图书馆藏南宋内府写本《洪范政鉴》的序言之页。该书曾为藏园老人傅增湘先生的双鉴楼的“双鉴”之一,另一部为宋刊百衲本《资治通鉴》。有关行款、递藏、避讳、藏书印诸项,可参阅李致忠先生《南宋内府写本〈洪范政鉴〉影印序》(本刊 2002 年第 3 期)及《藏园群书经眼录·子部》(中华书局,1983 年)。(容坤)